

“新傷痕時代”及其文化應對

楊慶祥

提 要

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應該從何種層面來對這個時代命名？這是知識者的責任和義務。在全球化和中國本土的雙重視野中，楊慶祥從精神性的角度將這個時代命名為“新傷痕時代”，它在普遍的意義上指的是一切非人性的秩序對個體和共同體的傷害，它在其最具體性上指的是中國的“改革”之陣痛及其傷害。楊慶祥進而提出只有通過有效的“新傷痕文學”的書寫，才能表達、呈現並拯救這種傷痕。

關鍵詞：新傷痕時代 新傷痕文學

—

對於中國及其完全置身其中的世界來說，2016 年或許是一個特別需要注意的年份，一系列事件(event)的發生和發展終於在 2016 年迎來了其最嚴酷的後果：英國戲劇性地公投脫歐，特朗普在美國以惹人爭議的方式入主白宮，老歐洲的靈魂在極右和泛左的角力中顫抖，而燈塔之國，正在悄悄調整其光芒投射的方向。在被扭曲了的伊斯蘭恐怖主義和基督教信徒爲了他們各自的“主”而互瞄準星之時，奧巴馬在離任之際的巧舌如簧也不能撼動“步槍協會”背後

龐大的資本利益。綠營在中國臺灣地區全面擊敗藍營,而後者,已經無法以政治的方式來化解黨派的危機。中國在東北亞和南海的立場不僅僅受制於其國際博弈的準則,同時也深深受制於其內部的經濟和政治秩序,和世界經濟的“不景氣”相關——宮崎市定的《中國史》一直以“景氣”與否作為討論中國歷史發展變遷的基礎——中國的經濟也開始陷入一個左右為難的狀態,大量的熱錢盲目地湧入又湧出,其所到之處,除了喂肥幾個“時代寵兒”之外,帶給更多人的,不過是巨大的失敗感——而那些時代的寵兒,將會在新一輪的洗牌中被重新踐踏,且不知道那幕後黑手究竟是誰?……這種種的發生之事迫使我們將2016年前後這一段時間從一個年代學的時間裡抽離出來,而放到某種歷史的終結同時又是歷史的“天啓”來予以衡量。當然,我們可以借用本雅明來自基督神學的概念,一種彌賽亞時間開始了。

也就是說,需要對這個時代——我們已經背棄這個概念良久——重新予以凝視或者命名。時代的隱秘性和恐怖性要求我們重新回答時代的核心問題,這是一個什麼時代?或許這麼提問本身已經犯了一個形而上學的錯誤。但我們必須回答這個問題,不是在科技主義的傳統而是重新在人文主義的傳統上回答這個問題。今天的人文主義正遭遇最嚴重的危機,這一危機不是來自科技主義和消費主義的衝擊。最嚴重的危機在於曾經可以提供價值和解釋的人文主義知識分子已經無法窺視這個時代的本質和核心,也無法彙聚知識的光芒,並提供哲學上的解釋——並非不可能,而是自我和他者雙重眼光的喪失,人文知識者至少在部分上放棄了自己的“天命”,這一天命就是通過自我觀察他者,認知時代,並賦名。

阿甘本在《何謂同時代人》中提出了重要的“同時代人”的概念,其實他是在重新召喚一種凝視和命名,雖然在後現代的知識場中,這種凝視和命名變得如此困難,但他依然說,要成為同時代人,就必須有一種視覺上的人文主義,凝視黑暗,但目的是為了看見光。

二

讓我們將眼光從對世界的凝視轉向中國。結構性的問題——我曾經在

《80 後,怎麼辦》裏面提出——看起來已經無法撼動。政治的內驅力正在越來越乏力,和世界上所有的超穩定結構一樣,它面臨著自我的猛烈吞噬。以至於它也必須不停地追問自我的合法性,他們將這種合法的焦慮訴諸於某種或隱或現的手段和權威。可以說今日的中國重新面臨著歐洲的現代問題:世俗性的裝置(法律、條令、國家)已經擴展到一切層面,而對於“世俗性裝置”的拯救卻遲遲沒有“降臨”。這一拯救的方案曾經以不同的形式在歷史中上演,在 1950 年代,它許諾的是共產主義的遠景,並在隨後的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以全民動員的方式向更激進的方向推進——這種推進帶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和宗教式的壯烈——雖然在最現實的層面,它帶來的更多是一種社會的無序和潰敗。它在不同的層面被延伸,在形而上的一面,它甚至樹立了一個“偶像式”的中國形象,並向部分世界滲透而塑造其追隨者,至少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區得到了最詭異的戲仿。而在其最現實的層面,它直接導致了另外一個時代的來臨,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因為意識到了這種拯救方案的破壞性效果,而徹底放棄了這一“拯救”的層面,在最大限度上強化世俗裝置對於人的“改革”和“解放”。這一過程持續了三十多年,而這三十年尤其是最近的 20 年,正是通過對一個全球性“裝置”的加入和迎合,中國作為一個地域意義上的經濟體的地位得以鞏固,而從這一經濟體中獲得或多或少的紅利,成為了合法性最大的黏合劑。但關鍵問題是,不平衡——這一不平衡首先是全球性的,我們想象中的全球化利益均分僅僅是一種天真的想象,佔據食物鏈頂端的經濟體會將最大最優的利潤拿走,並將極少的劣質利潤留給那些處於次等食物鏈者,更糟糕的是,還有廣大的根本無法進入這一食物鏈的區域,他們只剩下赤貧——2011 年,非洲之角索馬里陷入嚴重乾旱,1 100 萬人面臨饑荒,其中包括 650 萬兒童。全球性的不平衡並不外在於任何一個經濟體,它其實是整個資本主義發展最內在的本質和邏輯,因此,我們會直接體會到這種不平衡是如何地直接地作用於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

不平衡的地域,不平衡的階層,不平衡的性別,不平衡的利潤和權力的分配,這種不平衡如果說在前媒體時代還不為大多數人所知,那麼在一個自媒體時代,已經變成了一種人盡皆知的事實。數位技術的發達和人類對於“謠言”、

“秘密”的窺探本性“完美”地結合起來，微信、微博等自媒體平臺帶來的不僅僅是資訊獲得和交換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種新的參與公共生活的可能性。不過在當下，它的這種可能性被嚴重扭曲了，因為那些可知和不可知的原因，它將這種可能性引向了最糟糕的一面：自我的炫耀，對政治秘聞的探頭探腦，小圈子的封閉和拒斥。這種生態加劇了不平衡，最後，所有的不平衡都落實到了其最不願意呈現出來的後果：一種不平衡的生活等級被建構起來了。在這種生活等級裏，所有人都在張望和臆想——生活在別處，或者說更好的生活在別處——於是出現了三種精神狀態：第一種是對高等級生活的羨慕、嫉妒甚至仇恨，只要有合適的機會，就會對其展開復仇；第二種是對置身於本等級之內的生活的不滿意，厭倦甚至自我憎恨，“逃離”成為流行的姿態，而其內面，不過是“出人頭地”的欲望無法得到即時性的滿足；第三種則是對低等級生活的不可一世的傲慢、偏見和憎惡，即使在其最“優雅”的處置方式裏，也不過是將這種生活自動屏蔽在整個社會生活之外。這互相區隔甚至是相互仇視的精神狀態導致了一種巨大的分裂——不平衡總是與分裂密切相關——一種可望的共同體形態徹底破裂了，想想 1980 年代那首流行的《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吧，今天聽起來，完全成為一種反諷。

文化學者許倬雲和趙汀陽都持有相似的觀點，一個共同體存續的幾個必要條件，第一是經濟，第二是政治，第三是文化。這三者相輔相成，才能成就共同體的穩定和鞏固。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觀察，我們可以將 1980 年代以來的中國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通行朝野的意識形態是個人奮鬥主義，並以此替換前此的“公家”主義，通過個人分紅和“發家致富”等方式來彌合前此帶來的價值觀破裂。這是 1980 年代改革的原動力，但是當這種“個人”在利潤的誘導下變成“缺乏約束的利潤動物”之時，事情就發生了質的變化。個人奮鬥異化為成功主義和消費主義，個人奮鬥中質樸的、神聖的勞動哲學被抽空，成功主義和消費主義中的投機性和食利性被放大。與此相對應的，是經濟國家逐漸轉向金融國家。在 2017 年伊始，國家在財經工作會議上宣佈要加強對金融的監管和監控，並任命一批以強硬著稱的專家型官員擔任各大金融監管機構的領導。這一舉動其實從反面證明了，金融的虛擬性和“非

產出性”已經對共同體的安全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同時也說明，以“分紅”為模式的“經濟驅動”已經與它的初衷背道而馳。第一階段可以說就此宣佈結束。

第二階段並非在時間上緊隨其後，而是在數年前已經開始，文化被置於這一階段的核心位置。文化一方面作為一種產業得到重視，但我以為大部分人搞錯了方向，文化作為產業依然是經濟模式的延續；更重要的是文化作為價值觀和認同感的意識形態面向。但後者可能被扭曲得更加嚴重，薩義德曾經尖銳地指出：東方的知識分子在面對現代化的衝擊時，往往會迫切地投身於現代化，一旦稍微受挫，又會立即轉身投入到所謂的偉大傳統和經典中去，並將這些傳統神聖化和魔幻化。對所謂的傳統文化不加辨別的、充滿盲目熱情的擁抱和推廣或許在本質上符合一種僵化的意識形態的慣性模式，但毫無疑問卻構成了智識上的極大腐敗。從這個角度看，當下的文化的腐敗更值得警惕，文化的腐敗是根本性的，它會將一個民族的文化徹底腐蝕一空。藉助某種機制（如有影響力的媒體）的力量來推行這種文化的腐敗，並誘導普通民衆和一部分知識分子加入其中，同時對其進行商業上的推廣，這樣做的後果是，一種淺薄的復古主義甚囂塵上，它在思想和智識上雙重地瓦解著現代社會的基本要義：心靈和人格的獨立，並以此為基礎質疑並批評現存的不合理的秩序和規則。

在另外一部分知識分子那裏，他們對傳統的追求帶有更加直接的政治性。他們當然不屑於將傳統娛樂化，卻同樣對傳統抱有某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們最擅長於將當代問題歷史化，以為一切問題都可以在“至聖先師”們那裏找到答案，於是，一批曾經坍塌的偶像又被重新樹立起來：孔孟、老莊、程朱、陸王。他們試圖恢復這些學說在古老中華帝國的顯赫地位——實際上是試圖建立一種新的“官學”——但因為對歷史和當下的雙重誤判，這些學說與現實語境難以發生本質性的關聯，因此並不能提供黏合“共同體”的價值觀作用，而是流於表面，和那些被娛樂化了的傳統詩詞一樣，這些學說變成了一種“偽學”。“偽學”在當下的盛行讓人想起百年前張之洞的擔憂：“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

三

因此要大膽地追問：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時代？

從階級和分配的角度看，這是一個不平衡（不平等）且這種不平衡（不平等）被“正當化”的時代。

從產能和利潤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嚴重過剩的時代，且這種過剩在進一步加劇不平衡和不平等。

但我所謂的對同時代的凝視，卻不能僅僅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在我看來，對政治政治學的拯救必須引入文化的維度，也就是從精神性的角度切入這個時代的精神內裡——就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觀察和感受來說，我的回答是，這是一個**新傷痕的時代**。它主要有以下幾點內涵：

第一，從世界性的角度看，冷戰後的發展主義重建了一種以歐美為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而這一新秩序構成了新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利益秩序，在這一秩序下，新一輪的剝削和掠奪造成了新的傷害：失業、高强度的工作和日益沒有保障的未來生活。更重要的是，圍繞這種發展主義生產了一套強大的話語，那就是“發展萬能論”，並在這種“發展萬能論”的基礎上產生了一種道德的野蠻主義，並不惜為此損害個體的全部身體和心理。

第二，中國近三十年與這種世界性同步，並內化了這種世界性。將發展主義推向了極端。GDP 和利潤至上主義不僅綁架了社會，同時也綁架了個體。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對社會和個體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在這樣的歷史情勢中，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生活和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個人生活都幾乎變得不太可能。在人文主義的傳統中，對這種真正的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保護是非常重要的面向，福柯在 1970 和 1980 年代曾經發表了兩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一是《必須保衛社會》，第二是《什麼是啓蒙》。福柯正是在當時的政治經濟語境中看到了“個人”和“社會”的雙重危機，從而在康德的傳統上來捍衛人的主體地位和社會的自我能動性，並以此抵抗日益強勢的經濟—政治的一元主義。

第三，與前此時代的傷痕不同，在前此時代，傷痕往往是可見的，它有一些具體而現實的表徵，比如戰爭、暴力和政權的更迭帶來的傷害。但新傷痕時代的傷害往往是隱性的，不具體的，綿軟的，是一種可以稱之為“天鵝絨式”的傷害。這是一種真正的精神和心理的內傷，它導致的直接後果是精神焦慮、抑鬱等精神分裂症的集體爆發，而吊詭的是，因為並有意識到這種精神分裂症背後的傷痕，對之的診斷和分析也變得模稜兩可甚至陷入到道德的兩難。

第四，總結來說就是，新傷痕時代是在“世界”和“中國”的雙重坐標軸中，同時兼具中國性和世界性的一種時代精神症候。它在普遍的意義上指的是一切非人性的秩序對個體和共同體的傷害，它在其最具體性上指的是中國的“改革”之陣痛及其傷害。

四

指認這個時代為新傷痕時代，並非是最終的目的，對時代的命名是為了尋求一種解決的方案。命名的過程，也是方案選擇和建構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新傷痕時代是對此時代精神性的一種命名，而方案的選擇，自然也指向深具精神性的文化。在這種種的文化應對中，一種我稱之為“新傷痕文學”的文學潮流佔據了獨有的位置。具體來說就是，從本世紀伊始直到當下的此刻，新傷痕文學構成了新傷痕時代最具有美學症候的書寫和表達，在歷史的綫索上，當下的新傷痕文學與 1980 年代出現的傷痕文學書寫在延續和區隔中凸顯出“新”的特質。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這裏所謂的傷痕文學書寫不僅僅指 1980 年代初的傷痕文學潮流，而是更廣義上的 1980 年代對“文革”的反思和書寫——極端一點來說，1980 年代的全部書寫都是一種傷痕書寫。由此凸顯的新傷痕文學書寫的特質如下：

第一，相對於 1980 年代“傷痕書寫”以文革史為書寫物件，“新傷痕文學”書寫的物件是“改革開放史”。

第二，相對於 1980 年代“傷痕書寫”的人道主義話語，新傷痕的一部分寫作延續了這一人道主義話語，而另外一部分寫作，則從政治經濟的現實出發修

正了這一人道主義話語,呈現多元的精神視野。

第三,如果說 1980 年代的“傷痕文學”是一種對抗式的寫作,並由此呈現出一種恨的美學,那麼新傷痕文學書寫出現了一種對話式的傾向,並出現了一種愛的美學。

第四,在對話的寫作姿態和愛的美學中,新傷痕文學不僅發現並揭露了傷痕,並對此傷痕進行了照亮和療愈。看到陰暗和傷害不是目的,而是爲了重建確定和信任的希望哲學。

在《何謂啓蒙》中,福柯借康德來追問,“現在在發生什麼?我們身上發生了什麼?我們正生活的這個世界,這個階段,這個時刻是什麼?”

我的回答是,社會和個體都已經傷痕累累,雖然每個人都在興高采烈的生活,但每個人都在盲目地服從著自己的欲望和傷痕,其暴戾和仇恨,因爲強力的壓迫而像地火一樣運行。新傷痕時代的新傷痕文學作爲文化應對的方式之一種,能夠引起療愈和拯救的希望,但是卻不是全部。新傷痕時代要求提供一種更加具有整合作用的文化,一種剛健的,闊大的,融合了古今中西最優秀精神遺產的具有高度創造性的文化,一種基於此時此刻並同時內含了過去和未來的文化。因此,我願意再次強調一點,對時代的凝視和命名不僅僅是爲了批判,而更是爲了建設。“新傷痕時代”也是新希望、新建設時代,是文化、社會和個體重造的關鍵性時刻,是彌撒亞和天啓時間的一次精妙的對接。而在此時此刻,我們看到了這種可能的微光,也許只有這一次,這一瞬,在這一次一瞬之間,歷史的天使就會在廢墟中騰空而起。對同時代人來說,爲這一騰飛助力甚至犧牲,是不可回避的天命所系。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The Age of New Scars” and its Cultural Response

Yang Qingxia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What age are we living in? From what perspective can we name this age? These are two very real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of intellectual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globalization and domestic China, the author of the present study has developed the concept of “The Age of New Scars” from an intellectual standpoin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Age of New Scars” refers to all sorts of harm and trauma that the inhuman order brings to the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In a more specific sense, it refers to the throes and damage during the “reform” of China. The author further proposes that only through effective writing of “New Scar Literature” can we express, represent and finally heal this kind of scar.

Keywords: The Age of New Scars, New Scar Literature